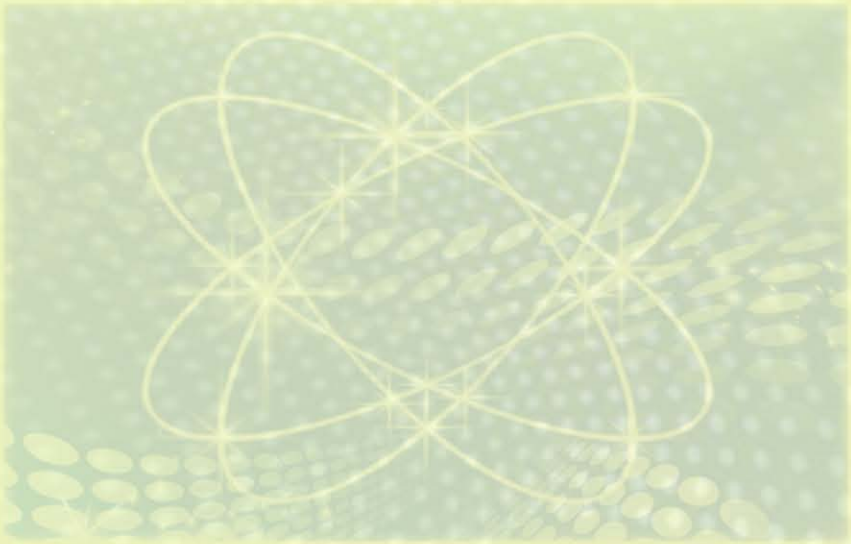
江西文史

第7辑

许怀林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江西文史 . 第 7 辑/许怀林主编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210 - 05931 - 8
Ⅰ. ①江… Ⅱ. ①许… Ⅲ. ①文史资料 - 江西省 Ⅳ. ①K29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096401 号

江西文史(第 7 辑)
主　　编: 许怀林
责任编辑: 胡　滨
封面设计: 章　雷
封面题字: 黄天璧
封底图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印”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 - 86898565
发行部电话: 0791 - 86898815(发行部)
邮政编码: 330006
网址: www. jxpph. com
E - mail: jxpph@ tom. com　web@ jxpph. com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5931 - 8
赣版权登字 - 01 - 2013 - 11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6. 00 元
承印厂: 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刷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赣地教育

1　铅华洗净忆五中　闵　强
7　一生为教育　笃志救中华　熊术忠
10　汪山土库程氏家族的教育传统　潘后军
17　纪念周兰清老校长——怀念母校葆灵女中　杨果慧
21　如履薄冰与如沐春风　吴小红

史学研究

24　“客家”是土著，不是中原移民　许怀林
32　陶渊明儒学观是非评议　吴勤喜
35　杜牧与张好好　俞兆鹏
39　探寻朱熹与黎川的未解之谜　江建华
45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龚重谟
50　陈礼江创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廖宇阳
56　蛇年谈蛇——中国古人对蛇的药用、食用及蛇皮制作器物　王曾瑜

日寇罪行

60　日本细菌战战略的实施及其在江西造成的祸害　吴永明　谢志民
70　日本侵略军对江西地方工业的破坏　邹耕生

江西人物

77　报人、学人、政人、方志人——记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吴宗慈先生　张满满
81　景寅山记　李国强
84　何时重与细论文——怀念谷霁光先生　夏麦陵
89　瞻望勿及　伫立以泣——深切追忆武建伦先生　龚国光
96　桐城“硕士”:陈用光论　廖太燕
102　寒门出巨公　数代有诗风——清代临川荣山下麓的李绂世家　杨华林

馆员风采

109 他山有砺石　良璧逾晶莹——记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国画家平德威　萧　斌

文学漫步

115 关于话剧《陈毅出山》的艺术构思　蔡德予
120 山西考察记游诗稿九首　文师华
121 从未名湖到鄱阳湖　许智范
125 话说“新风楼”　赵子循　王令策
129 麻姑山，一座秀美的诗山　罗伽禄
133 古籍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范例——评陈水根先生《精选名儒草堂诗馀校注》　胡长春

考古研究

136 从考古发现看江西商代文化　周青春　陈福云　金来恩
141 桂林明靖江王墓青花梅瓶试析　余家栋
147 北宋文学家徐铉籍贯生平墓葬考　张启予
150 黎川老街古建藏精粹　黄少清
154 稀见的私家园林——玉芝园与《玉芝园志》　王令策

艺术研究

156 康熙釉上五彩装饰虚静空灵论　陈一文
161 黄庭坚书法艺术风格形成探析　唐　建
163 用歌声传唱本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畲族文化略识　周沐照
168 试论“淡墨轻岚为一体”　毛冰霜

往事回忆

173 我与江西人民出版社　喻建章

书画长廊

179 杨农生书法
180 金晨国画

附录

183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王靖忠等同志为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通知
新聘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简介(21人)

编者按:在这组文章中,有封建时代程氏、熊氏家族办的书院教育,有民国时期外国教会办的葆灵女子中学,有新中国成立后开办的南昌五中,还有现今的年轻博士的教学感受与生动故事,它们相互连接,展示出中华民族关注教育、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在这项世代接力的追求中,矢志不移的期待是学业与人品兼优,企盼子孙成长为既是能干的劳动者,又是道德高尚的正派人。本着这个宗旨,投资于教育事业,兴办书院学校,要求领导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教师既能教书,又善于育人。这里汇集5篇文章,是古今经验的集萃,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有人说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其实从古至今莫不皆然。优秀人才承前启后,开创事业新天地,庸懦者必将导致衰败,被贬作败家子。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学校非追求利润的企业,道理本来简明,关键在于实行。

铅华洗净忆五中

文◎闵　强

1960年的秋天,秋风格外萧瑟。南昌的初冬,冷峭刺骨的寒气已提前肆虐着大地。十四岁的我,从南昌二中两年制的"跃进班"毕业,考入南昌五中四年制的"理工班"。四年后,又考入同济大学。虽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抚今追昔,内心难抑平静。系于未来,将老五中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载体,有必要将那个特定年代的良师师德、校风校纪、备尝艰辛的求学感受以及高中基础教育的滋润与得失,真实地告诉我们下一代。

(一)昔日校园掠影

南昌五中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第一高中。现有校园已物是人非,唯独两栋教学楼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刷后风姿仍旧,只是平添了时光的刻痕和苍凉。

两栋三层的教学楼对称围合布置,红瓦斜坡屋面,墙面周边转角用苏州园林装饰线条点缀,具有浓郁的民族建筑风格。

教学功能与建筑造型,尺度得当,典雅精妙。按黄金分割比例建造的三道拱圈门洞,参照营造法式,镶嵌在每层楼的中央。具有宫廷外廊符号的三排廊柱,使正立面的视觉效果特别丰富。窗间墙用鹅卵状水刷石饰面,也算是20世纪50年代建筑设计的时尚。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有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的亲自关照,财政能挤出经费,建造这样好的教学楼,足见对省立第一高中的重视。

学校坐落在南昌市东郊,当时周边尽是菜地农田、水塘泥滩,似乎有意浮游闹市尘埃之外,避开喧嚣,让学生以恬淡的心境,专心读书。

(二)良师聚集,治学严谨

全校三个高中年级,1500余名师生。学校聚集了一批江西省高中阶段顶尖的优秀师资。有的任课教师是由省政府直接从大学调入。老师都非常敬业。我记忆中的师长有:邓庆余(政治),王章庆(语文),邓志揆、许竹荪(代数),熊大桢(几何),张光才(三角),钟盛(俄语),龚生松、张季昶(物理),石适华(化学),教导主任毛丽芬。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霞蔚云蒸,阵容整齐。

校长张鹏,军人出身,据说在辽沈战役打四平立过战功。他又兼书记,在大家心目中,就成了党的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身。他说一不二，教师都惧他三分。张鹏浓眉方脸严肃有余，个子不高却分外壮实。只有在大会上，才能听见他声如洪钟；有时在校园中心位置，他如门神般站立，严肃注视着不谙世事的过往学生。他对违规学生，在大庭广众面前立马传唤，并严厉训斥。有一次竟然咆哮如雷："你不改正？我明天就开除你！"学生普遍对他敬而远之。校长的军人风格，确立了五中井然严明的校风。

学校实行封闭管理，规定学生必须住校寄宿。家居市区的只能周末回家住一晚。周日当晚七点，必须回教室自修，并逐一点名。因为这种约束，使一大群十几岁生龙活虎的少年，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衣食起居就面临准军事化管理。

青年教师李堂才，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实施者。他教物理，讲概念引人入胜，黑板书写一流。他的敬业精神和对孩子们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表现为对一群少年学生的严格监管。他既身体力行，起早贪黑向孩子们示范；又声色俱厉，事不分巨细，体不分强弱，时不分昼夜，令行禁止。女生对他望而生畏，男生对他早起晨练的吆喝，如老鼠见到猫。

在朝夕饥肠辘辘的条件下，五中仍然严格规定，准时熄灯入睡，统一打铃起床，用膳严格定量，考试竞赛频繁。

白天的校园，真可谓读书声与天籁齐鸣。由于附近几乎没有建筑物，入夜的教室，晚自习的白炽灯光，虽集中在两幢教学楼，却把五中附近的一片夜空，照得通明如白昼，格外引人注目。

当年，南昌五中各门学科的精英教师，治学严谨，在文理学科交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的授业智慧、教学理念、导向和探索，像屹立在河岸边的微弱灯光，虽然比不上明亮的航标，还不能完全为我们青少年的人生导航，但毕竟筚路蓝缕，助我渡过难关。

这批精英教师是老五中的脊梁，使我们学会了独立生存，领悟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尤其是为我们顺利进入高等学府，教会了大家如何捡起这块有效的敲门砖，我终生难忘！他们在应试高招方面，特具敏锐和睿智。有两例为证：

其一，1964 年 6 月，高考迫在眉睫，物理老师龚生松突然召集全班同学，向大家发问：气态方程中的 $PV/T = P'V'/T'$，是在密闭条件下公式才能成立，如果漏了 5 克气体，你们有谁能解出这道方程？当全场沉默了几秒钟后，他欣然出招演算。十几天后，我在考场目睹物理高考试卷，果然出现类似考题，且为 10 分题。我惊喜之余，立即手到擒来。

其二，1964 年 5 月某日清晨，政治老师邓庆余在研读时政要闻的一刻，对考题嗅觉特别灵敏，他突然来到教室，要求大家一定要熟读刚刊出的一则中苏两党论战时政要闻。其中一道高分题，果然也被言中了！

难忘高考前夜，南昌酷暑难当。邓庆余老师突发奇想，在两幢教学楼间的场地上，临时拉线架起了四盏大灯照明。顷刻之间，几十张桌椅全面铺开，各门功课的教学精英在露天灯下，为学子们解题。他们时而伏案疾书，时而站着滔滔不绝……

这就是当年南昌五中的校园、校风和良师，在我离开五中后的近半个世纪，留给我难以抹去的记忆。

（三）勤能补拙，笨鸟先飞

在我入学的第二年，学校传颂着两个范例。

其一，1957 年，全省考入清华大学 40 人，江西省一高中（南昌五中前身）就有 21 人！考入北京大学 11 人！

其二，1962 年春，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倡导和主持下，由北京统一命题，全国各省会城市公开举行数学竞赛。南昌市的夺魁者，就出自老五中的应届毕业生罗伟民！当年，盛传他因此免试保送，而实为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这两个典型范例，最直接地激发了我对学好数学的兴趣与强烈愿望。不到一年，我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1964 年初春，全校展开第二轮数学复赛，选拔人员参加南昌市的数学竞赛，公布的名次是：第一名万广林（后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也不到 70

分，第三名李京华，60 分刚出头，我排第二名。想到老五中高手林立，能获得亚军，也颇感自豪。

我属以勤补拙，笨鸟先飞。由此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贮仓结构工程专业领域，曾因设计一项新结构，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投资。在 4800 吨的大型贮仓结构设计中，用 6 厘米厚的钢丝网水泥薄壳，成功取代了 30 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厚壳，当时在国内填补空白。在演绎弹性力学结构计算中，遭遇二阶（贝塞尔）偏微方程，后因解决了该工程设计及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独立获得国家科技成果证书及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其中求解二阶偏微方程，实际上已超出了工科大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教程范围。

深究其源，还是在五中的数学题海战术中，锻炼了“童子功”，接受了大量数学解题的潜移默化。正如数学家杨武之所说，由于有大量数学练习，“其推理能力多有增进，于计算方法受到训练”。有了推理能力，就有创新动力。

（四）怀念“三角大王”兼班主任张光才老师

1964 年，高考结束不久的一个傍晚，雷阵雨劈头盖脸下个不停。一位全身淋湿的中年男子，急急忙忙跑来我家。他就是班主任张光才老师，还来不及吃晚饭，就冒着倾盆大雨，从南昌市的东郊赶到市中心向我下达紧急通知，第二天早上必须赶到省招生办去当面答疑。事后才知道，同济大学已按第一志愿将我录取，只是以省高招办的名义通知我本人去当场核查视力，令我们全家感动万分。后来同学聚会又见过张老师几面，我曾几次向他表示感激。他却说“已记不清了，不要放在心上。”

张老师因在三角函数教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其教学声望不胫而走，历届学生给他起了个“三角大王”的美称。我利用寒暑假解了大量数学题，却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核对。我找过邓志揆老师和张光才老师，他们总是挤出休息时间为我批改，张老师还提醒我“三角大王”的称呼不妥，三角课程不是孤立的，许多代数、几何、三角公式与定理，是可以相互证明的。不要拘泥一种方式求解。这种拓宽思路、触类旁通、强化推理的教学理念永远不会过时。不仅在当今基础数学教育中需要推行，而且在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时，仍然行之有效。

张老师早年不经意地以哲学高度，启迪了我的基础数学逻辑思维，使我终生受益。其师德也让我终生难忘。

（五）由“理工班”的甜与苦，想到王章庆老师

反思高中生过早进入“理工班”学习，虽有利高考应试，但弊端不少：“医农班”的不懂数理，“理工班”的不懂史地，直到最后一年，“理工班”才开始恶补历史、地理、生物。

历史老师曾德围有如赶场，上午一堂课，讲完了中国十个皇帝；下午一节课，讲完了两次世界大战。注重数理的学生，有如腾云驾雾听说书。

生物老师梅焕明，唯恐“理工班”学生搞不懂，用南昌口语与普通话交替使用，讲解肾脏及人体器官常识，大家似懂非懂，莫名地哄堂大笑。

同济大学有位校长讲得入木三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跛脚严重的学生，很难成为有大创意的工程师。”

所幸我念高三时，语文课文言文遇到了真正的启蒙老师，他就是当时满腹经纶，又愁绪万千的王章庆老师。上世纪 60 年代初，学校动员教师上山下乡，他在表态发言说了一句口头禅“船到桥下自然直”，受到严厉批判。

王章庆老师毕业于 40 年代的南昌中正大学（现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文史功底深厚。他表面虽沉默不语，内心却是在忍辱负重，深爱着自己的学生。他用鄱阳腔认真讲解古文，难懂无味的《楚辞》《史记》篇章，被这位先生摇头晃脑讲得声情并茂、出神入化。一群热衷数理化的“理工班”学生，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他用心讲解《屈原列传》和《孔雀东南飞》的神情和抑扬顿挫的声调，我至今未忘。

1964 年的初春，他为了激励我班备考，写下对联：“时至鱼龙多变幻，春来桃李竞芳菲。”亲自张贴

在教室门口，特别醒目提神，很是催人奋进。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他此举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政治动员令相悖。后得知，他正因为当年鼓励学生“跃龙门”而付出了沉痛代价。次年，他就被军人校长强令调离，“文化大革命”中在备受凌辱与打击后，总算被发配农村养猪多年才死里逃生。等到改革开放后他重返讲坛执鞭授课之时，但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们的五中岁月，基本在三年困难时期度过。当年全校大兴“一种三养”，在操场种南瓜，在空地种蔬菜，用树叶磨成汁，用碱水做稀饭，终日半饥不饱。读书、生活、文体活动照旧。艰苦求学，兼民兵训练不断。我们在拼命读书的同时，还兴致勃勃练习单杠、双杠和中长跑。

当时，每人每月三两食油，大饼油条是稀罕之物。每餐饭菜严格限量。有的男生学习专注，当步入食堂，才发现因上餐多吃了一点，而下餐的饭票则囊中羞涩，甚至窘困到喝不上一碗稀粥时，其他同学还能友情为重，主动扶助，支援饭菜票，以解更困难的同学一时之饥。

个别男生，由于家庭远离南昌市，亲属无法增援口粮，且饥饿难当，饭量失控，一个月的饭菜票，三个星期吃光。为了减少热量消耗，竟以摸索出忍饥挨饿的功夫为能事，向密友推介。诸如吸气要多而匀，呼气要慢而深。多系一根腰带，使胃收缩也可以减少饥饿；还有早餐仅喝杯盐开水，少言寡欢；中餐一碗稀粥，闭目养神或卧床休息；晚餐觅食堂免票大锅清水咸菜汤，再用开水泡脚，则可养精蓄锐至天明。如此日复一日，不亦哀哉！为此，学校改为每日三餐划卡，不得跨时用餐。虽经常半饥不饱，却也解决了个别男生的断粮之虞，不至于威胁到生命。

后来据说，省内有的寄宿制中学，当年因无法解决食堂吃饭问题，只有停办或兼并。南昌五中大食堂也有过濒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军人校长凭借他的公关与威望，千方百计从西湖区调集到一批储备粮食，才解决了千余人的吃饭问题。到1963年上半年，早餐在稀粥之外惊现馒头，素菜中餐也偶见肉末和猪油渣搭配，伙食渐有好转。

有的同学家境十分贫寒，而学习优异，单科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除了有微薄的助学金相扶，还占用大量的寒暑假及课余时间，为学校刻钢板，用勤工俭学的收入，来维持最低生活标准。

当有同学突患阑尾炎，疼痛难当甚至危及生命，全班十几个男生就不顾一切，用担架轮换肩扛手抬，在寒冬的夜晚，赶了十几里路，赴省二附医院抢救。脱险后主治医生望着我们这些稚气十足的少年伙伴感叹：“算你们送得快，已经化脓穿孔了，再晚半个小时就没命了！”

这些远离家庭、提前过独立生活的半大孩子，在全国普遍极其贫困的条件下，的确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约从1963年春天开始，五中校园的中心位置，冒出了一座精致的构筑物——“优秀学生光荣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每天，成群的观望者都驻足静静地思考着。“光荣榜”上有约十几名优秀学生照片、事迹与学习经验介绍，每学期更换1～2次，令人羡慕不已，成了学子们心仪的荣誉殿堂。

五中老师总是以高考评分标准严格评分。对上榜的优秀学生，有项硬指标：期中或期末大考，七门功课平均必须在85～90分，而且几项单科成绩，必须在全年级的前10名。达到硬指标，还要品学兼优，班主任核定同意，校方批准才能上榜。

1963年的冬天，期末大考结束。我被校总务处正式通知，去南昌市有名的“真真”照相馆拍单人照。1964年春天开学时，我终于也上了“优秀学生光荣榜”。

优胜劣汰，这就是南昌五中当年特有的激励机制。高分得到肯定，优秀得到赞美。上游、中游学生得到鼓励，激发大家你追我赶。其特有的激励，怦怦然荡开我们青涩年纪正在成长的襟怀。

(七)时代的“幸运儿”与“捐门槛”

当年的高等教育,实属精英式教育。1964 年全国统招大专本科生仅 14 万,全国重点大学招生不足 5 万人,全国平均入学率仅约 1%。能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被社会公认为是时代的“幸运儿”,一点也不过分。

1960 年,我班入学原有 58 人,因各种原因 27 人休学除外,仅 31 人参加高考,结果 70% 以上考入大学。六名女生全部被录取。有十几人考入军事院校或全国重点大学。我的同窗挚友赵长风有三门单科成绩名列全省前三名。被清华大学录取后,被调整到对数学要求更高的工程力学数学系固体力学专业。一个班有这种成绩和入学率,当时,全省名列前茅,在全国也属先进。

未被录取者,除极个别临场发挥不当外,大部分人并非成绩不好,恰恰相反,有的甚至非常优秀,只是由于家庭出身或在直系亲属中,沾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边,或是有海外关系,或是社会关系有点牵连,都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

这些落榜的同学,大部分都立即响应号召,于当年 9 月,循规蹈矩进了南昌市北郊林场。当时,他们似乎都认识到只有去“农村广阔天地”,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热血,才能洗刷家庭的“污点”,而获得新生与希望。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他们相对更艰难,更坎坷。好在有“文化大革命”前南昌五中的高中文化底蕴护佑,有的顺应改革开放应运而起,有的自学成才,进而取得了本科及研究生学历或中、高级职称,还有的成了民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也有几人英年早逝,或死于非命,或不知所终。

有好几位高考落榜同学倾诉说:有的高考成绩已进入了北大录取线;有的高考成绩各科平均分已达 84 分,有的单科成绩全校拔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有人终于目睹自己的高考档案,赫然盖着一个市里政审机构的大印:“同意报考,不予录取。”更有甚者,连试卷也不批改,考分也是空白。

回想这些成绩优异的落榜同学,那时他们岂止是苦行僧式的艰难求学,精神上更要承受着“黑五类”子女血缘和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巨大压力。甚至有的成了“唯成分论”的惊弓之鸟。

在“出身不可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的政治召唤下,这些同学为了企盼政审过关,政治上特别要求进步,以憧憬加入共青团为崇高理想,还有的为了指望得到对血缘“原罪”的宽恕,在高考前的一个学期(1963 年的冬天),备考已进入关键阶段,他们采取了“革命行动”,在教室四周墙上张贴小字报,用最恶毒的文字批判他们的父母亲,表示要脱胎换骨,划清阶级界线。

当年这种违心的自戕做法,即便几十年后,有的同学虽然身份和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一旦提起这往事,伤痛依然存在。他们以不同形式自嘲地对我讲过,在五中寒窗苦读四年,曾为梦想读大学,千辛万苦全落空,恰似鲁迅笔下《祝福》中的悲剧主人公,将毕生的血汗钱和命运托付给了土地庙,寄情于为庙宇“捐门槛”,只盼来生交好运,历练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南昌如此,全国亦然。这岂是当今高中毕业生所能明白的?军人出身的校长原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敬畏、严厉、粗暴,后据说,他当年也曾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力挽狂澜千方百计帮助几名优秀学生改变了“捐门槛”的厄运,顺利考入高等学校。

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当人们不再贴有“黑五类”的政治标签,公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自由平等。在分数面前,高考考生才有可能一律平等。

我们感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恐怖,我们也亲历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变化。世事沧桑,个人命运总是和国家命运一样紧密相连,跌宕起伏。

(八)沉思录

往事并非如烟。

老五中曾经是江西省向全国著名大学输送生源的主要基地之一。

老五中以其独特的办学风格,也是培养应用型、

创造型人才的摇篮。

1958 年毕业于老五中(原江西省第一高中) 的张俐娜女士,是我国天然高分子材料及应用研究方面的科学家,2011 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61 年毕业于老五中的刘大椿先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是我国当代科学技术哲学界学科带头人,论著丰厚。最近又承担并完成了科技部的创新方法专项课题“卓越科学家的工作与创新方法系列研究”,主编并出版了一套 10 卷本的创新方法范例研究丛书。

1964 年,罗保林先生和我一同毕业于老五中,是我的至交,他现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国颗粒学、过程工程学及化工冶金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著名专家。他告诉我,老五中人才辈出,他只是其中“一根葱”而已。

……

南昌五中的兴盛、跌落、转型、复兴,与时代的脉搏一齐跳动。其中“跌落”阶段,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耳闻目睹“文化大革命”动乱初期,五中“一小撮”战斗兵团在江西全省声名狼藉。仅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而已,他们受“文革”的影响,效法北京的红卫兵,到处“造反有理”。给老五中,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其实他们自己也如做了一场噩梦,也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期长时间受到严查,有的甚至还搭上了年轻的生命。

老五中跌到低谷甚至消亡,“一小撮”仅仅是根导火线,决定权还是在执政者的掌股之间,他们开“左”灯,往“右”拐。于是,学校的声誉扫地,老五中的牌子消失。师资队伍解体,良师各奔前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砍一所学校只要一个决定,要办一所名校,不知要几代人的努力。恢复老五中其名虽属不易,发扬其实则难上加难!

如今学生身处网络时代,微博下帖盛行,文化传播神速,图书渐显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能、无奇不有的电子产品。“奥数”屡禁不止的原因是背后有庞大的利益驱动,有的“奥数”培训机构与名校招生挂钩,美其名曰“教育产业化”。凡此种种,无论是公办事业编制,还是民营股份机制,学校如果背离“授业解惑”、“教书育人”的宗旨,则势必急功近利,误人子弟,最后蜕变成以赢利为目的。

铅华洗净回忆老五中,记载传承寻找新感悟。

(作者: 高级工程师,首批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老南昌五中教学大楼 (许怀林摄)

一生为教育　笃志救中华

文◎熊术忠

熊育钖(1868—1942),字纯如,号仪炳,江西省南昌县冈上镇月池熊村人。曾祖父世昌,谱名中壁,字出宿,号莲香,“隐居教授”。祖父论和,字燮庵,莅香次子,故称“三大房”的二房。父亲光祖;号葛民,年轻时外出经商。太平天国期间,在修水经营熊氏产业,时逢太平军攻占修水,光祖在“危城中逃出,惊悸得心疾,不能治生”,一家的生计便陷于困窘。其母亲黄太夫人,“持家节俭,量入以为出”,她既要侍奉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又要教育五个儿女(三子二女),依靠家中有限的产业,使整个家庭的生计赖以维持。

一、求学时受西学的启迪

熊育钖从小读书,以备将来科举提名,他的性格内向,“少勤饬,寡言语,读书学习,不待教督。”正如他自撰一联“钩金虽小无他质,蚁力式微总耐长”。但是,他又深受其兄育钧的影响。育钧因家庭困窘,作为长子,只有辍学经商,担起家庭重任。他天性醇厚直谅、修德好善,虽身在市井,却颇具远见卓识。“勤勤以成第之学为至要至大之事”。自己被迫失学,“则益督弟以学”。而且,并不以让育钖默头诵读八股式律,以博取科举场上的发迹为荣耀,而是鼓励育钖读那些与科考并不相干,却真正有补时艰的著作。他为育钖买了大量书籍,“凡古今中外得失,兴亡治乱之故,礼乐刑政,食货兵戎之迹,与夫古圣贤人玮行名言,经纬万汇之道,恣其往复探讨”。使熊育钖大开眼界。

育钖20岁以前应童试,举秀才,补增生。1888年左右,他得识萍乡贺国昌(葦生)先生,并拜其为师,“得窥生儒学问门径”,受其影响,育钖阅读了大量张载、王阳明、陆九渊、朱熹及王夫之等人的文章,深受其干刚中心法志修身,躬行实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染,从此他更加厌恶科举,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炮火轰开了中国关闭已久的大门,也开始轰醒了国人数千年来所做的“天朝大国”的美梦。中西文化的交流对撞日趋激化。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失败,更使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感到切肤之痛。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屡次战败和由此造成的割地赔款,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自尊心,许多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中国再这样发展下去不行,必须实行改革。一时间,变法维新,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许多人士纷纷著出撰文,介绍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宣传自己的变革主张。而年轻的熊育钖也热切地关注并参与了这场关于民族命运的大讨论。

熊育钖是较早跳出沉闷的人。在光绪中叶,南昌还不易购得各种新书报,于是,他求人于汉口大购书籍,“得读曾文正、郭筠仙咸同诸贤文集”。戊戌前后,又读康南海(康有为)、梁任公(梁启超)、谭复生(谭嗣同)诸先生所著的书,“憬然知旧学之不足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熊育钖既嗜读新旧书籍,恨购书之不易,遂纠集同志,合股在南昌开设广智书局,从上海广运书报,通过大量阅读维新派人士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于是熊育钖“益明当时之务(思想),与戊戌诸党人相应和矣”。从此,受到了西学思想的启迪。

二、终生“唯一之志”是教育

戊戌前后,中国涌现了大批倡导变法,鼓吹西学的人士,其中,熊育钖最“服膺侯官严几道(严复)先生”,其思想受严复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就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古代儒学包裹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上的同时,严复却竭力介绍西学,企图把西学的精神输入中国,振兴古邦。严复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又在于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先生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赛的《群学肆言》等一系列西方学术名著，熊育钖系统地钻研过严复的一系列论著，并完全接受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因此，熊育钖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之后，选择了以兴办新式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终生“唯一之志”。于是熊育钖在取得家族的同意后，利用家族教育基金先后创办了心远小学、心远中学、心远大学。

1914 年，熊育钖任都督府教育科长时，建议在全省设省立中学 8 所，即将原赣省公立中学校改省立第一中学，洪都中学改为省立第二中学，九江中学校改为省立第三中学，赣州中学改为省立第四中学，饶州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五中学，吉安府立中学堂改为省立第六中学，抚州中学堂改为省立七中学，袁州中学校改为省立第八中学。改制后的八所中学校长，多由熊育钖推荐，熊育钖不愿居官，自请出任当时条件并不好的省立二中校长。1918 年，熊育钖从日本考察中等教育回国后，被推举为江西女子公学校长。

维新前后，全国各省都成立了大学，唯独江西没有一所大学，只有一些专科学校。江西许多学子为求学深造，只有远奔京、津、沪等地投考，痛感现状之落后，于是熊育钖毅然于 1922 年在三道桥心远中学校址内开办了江西第一所私立综合大学——心远大学。最初只有文科，后增设数理两科，熊育钖主中文系，远聘了一批毕业于国内外大学的江西籍才子为教授。大学开办后，一时颇有成效。1926 年教育部派员视察得许立案；教育总长章士钊还划出一万元专款奖励心远、南开、明德三所大学。为了办好心远大学，素性不喜求人的熊育钖不得不经常到京沪等地募捐，后又在南昌另购地皮，辟新地址建校。但终因缺乏社会有力支持，经费无着。1927 年 8 月又遭滇军朱培清部下抢劫捣毁，心远大学不得不停办了。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迅速侵占了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并向东南进犯。国民政府预感到南京难保，于是 1937 年 10 月 3 日决定迁都重庆。此时在南京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的熊育钖已年近 70，他不愿在京居官，乃依古礼上章乞辞，被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挽留，劝其请假回籍。他一回籍就料理心远中学。

1938 年 8 月 15 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南昌，省会各机关和学校纷纷开始向赣东南一带疏散。心远中学分三路迁往吉安、南城和冈上月池村。翌年，九江失陷后，留守在南昌的部分公职人员和居民再次向各地迁移，许多人都劝熊育钖离开南昌，但他执意不走。最后，被其学生杨不平强拉上汽车转移到临川。一到临川后，熊育钖即奔走于临川、南城、泰和等地，忙于维持心远中学及救济难民事宜。

抗战期间，熊育钖仍把主要精力用在教育上，沦陷区的许多儿童随父母逃难失学，特别是难民聚集之地，失学儿童更多，见些情形，熊育钖多方奔走呼吁，在他的努力下，南城和吉安陂头圩都设立了难童学校，一些失学儿童得到继续升学。熊育钖矢志教育之情常常溢于言表。1940 年他 72 岁寿辰时写的一首诗中有“专心求教育，毕生为此谋”之语。1941 年 1 月写给学生的一封信说：钖今年七十有三，目者谓“钖寿当跻七十有八，果尔，誓竭此五年精力于所办之学校。不复旁骛。”表示了他终生办教育的决心。

1942 年，南城陷落，日军侵驻南城后，心远中学损失惨重。当年 8 月，他赶赴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吁请省政府救济学校，得两万元救济款。9 月返宁都，在宁都时曾致信友好，略云：“如敌骑至宁都，誓当一死报国，不再偃蹇作逃生之计。”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1 月中旬染疾，18 日逝世。临终遗言：“心远从此公诸社会。”

三、笃志救中华

熊育钖一生笃行“教育救国”宗旨，他对江西近现代教育的影响和贡献，除了体现在由他创办和主持上述学校外，还体现在其他的许多方面。他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还担任过一些教育行政职务。1907 年被选举为第一届南昌教育副会长；1910 年被选举为江西教育副会长；民国元年（1912 年）被任命为省文事局副局长、局长；1914 年任省都督府教育科科长；其后还曾任江西省教育司司长。在任这些职务时，他积极为江西地方教育出谋献策，延缆人才。

民国元年（1912 年）熊育钖任省文事局（相当于

教育局) 局长时,他首先倡议省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建议得到李烈钧的大力赞同和支持,同年 8 月 28 日,江西省政务会对此提案议决通过,决定拨公款 10 万元,选送学生 102 名,分赴欧美日留学。9 月 2 日(此时熊育锡已应严复之邀到南京任京师大学堂斋务长)。由省文事局主持,在南昌开设考棚,各府区、县英俊青年汇集南昌、进行考试。据说,这次选考,李烈钧亲自把关,杜绝各种请托,考试结束,李烈钧还一一接见各位中选考生。据胡先骕回忆,由于中选考生毕业于心远中学的学生最多,李烈钧在接见时,常常问道"是否毕业于心远中学?"心远学生中,熊氏家族子弟为数又不少,为熊正理(育锡子)、熊正琬、熊正琚等人。1912 年 11 月严复曾写信给熊育锡祝贺,内云:"方今吾国教育机构,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枵窳不可收拾,子女欲成学,非出洋其道无由。闻君家从被选之多,令人喜不寐也。"

此次江西公开招考选送东西洋留学生一事,既开了江西历史上公开考选留学生之先河,同时也开创了江西本省历史上第一次选派学子到西洋留学的先例。此批出国留学的许多人,为胡先骕、陈寅恪、饶毓泰、程考刚等,都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

熊育锡兴教办校 40 余年,为江西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仅心远中学一校,48 年来高中毕业生近 3000 人,在他主持心远中学、省立二中、女子学堂三校期间,着籍学生几万人。"讲学之盛、近媲南开"。心远,二中著名毕业生有三类:一为科技工程方面的如傅尔敫、单人骅、吴有训、程孝刚、蔡方荫、杨尚灼、胡康宁、蔡枢衡等;二为教育方面的,为熊正理(育锡子)、东驹、陈颖春、李中襄、陈颖昆、缪正、肖赣等;三为政治、军事方面的有袁玉冰、黄道、曾天宇、张朝燮、江宗海、李大贞、傅清华、张国焘、饶漱石、程天放、彭学沛、欧阳恪、桂永清、李中襄、章益修等。

同时,熊育锡作为一个教育家,一生不仅致力于培养人才,而且十分爱才,他为江西教育界延揽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临川李证刚(灼翊)先生,博学高节,穷不能自荐,而熊育锡聘其为二中教员,心远大学开办后,又聘其为教授;植物学家胡先骕(新建人) 1915 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江西,被熊育锡聘心远、二中教师;吴有训也曾在二中任理化教师;还有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王易、余謇、欧阳祖经、彭醇士、熊公哲、傅抱石等均曾被聘为心远大学教授或心远中学、二中教师,1929 年他暂代省建设厅厅长时,在厅内设置了一个"昆虫局",听说杨惟义来南昌(杨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农业专业,曾任江苏省昆虫局技师),当即亲自上门聘请他任昆虫局局长,将杨挽留在江西(新中国成立后,杨任江西农学院院长)。因此,熊育锡的用人之道颇为称道,他看准了某人所具备的才能后,即放手使用,委以重任。"必尽其才,不掣其肘,不忌其权重逼我。"

熊育锡的"从教"与"从政"之间是一致的,他认为无论是教育还是从政,目的都是一个,即改造社会。中国社会的改造,既离不开科技工程人员的努力,也离不开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的改革,他常告诫弟子:"吾人不可无政治兴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服官为服务之好场所。"因此,只有政治教育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有效拯救国家民族。

熊育锡为人处世的基本特点是"公、勇、诚、爱、恒"五个字。所谓"公"是指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掺杂任何私欲或私情,这是他一生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勇",即行事不避利害,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葸退缩。"诚",指禀性肫良,质朴真诚,谆笃守信。"爱",爱国、爱民、爱才、爱门生弟子。"恒",即矢志不渝,坚韧不拔,始终如一,具体体现在他一生对教育事业 40 年如一日的追求精神上。

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与政治生涯中,遭际多次重大的历史转折,能够清醒地紧随历史潮流而不断前进。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倒袁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至对国共两党的认识的转变,都显示了他可贵的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主持正义的浩然正气。

(作者:江西省谱牒研究会豫章熊氏文史研究室主任)

汪山土库程氏家族的教育传统

文◎潘后军

新建县大塘坪乡的汪山土库，位于南昌以北45公里鄱阳湖西叉的汪山岗，是清代湖广总督程裔采、江苏巡抚程焕采、安徽巡抚程楙采（史称“一门三督抚”）等九兄弟集资兴建的府第，也是原国民党宣传部长程天放先生的故居。它始建于道光元年（1821），历时半个世纪，于同治年间（1862—1874）落成。整个建筑坐北朝南，以祖堂为中心，东西一字排开，占地108亩，内有房屋25幢，1443间，大小天井572个。建筑结构采取外墙青砖立斗灌泥，墙内侧定磉立柱承重的形式，外观青砖黛瓦，封火山墙，气势恢宏，巍伟壮观。内部巷道纵横、花楼重门。木雕、石雕、砖雕繁多，纹饰精美，有龙腾凤舞、狮子滚球、八仙过海、梅兰竹松等类。因建在汪山岗上，规模浩大，所以人称“汪山土库”。

汪山土库程氏家族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了一代代文彦俊士、社会名流。自清嘉庆末年出了程裔采、程焕采、程楙采“三个大红顶子”，至民国的100余年间，共有进士4名，举人11名，大小社会名流100余名。今日其后裔散居在北京、上海、成都、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以及台湾等地，有的还远至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十来个国家，皆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和骄人的业绩。

民谚说，“富不过三代，穷亦不过三代”。家庭富裕了，骄纵子女，不好好教育，就会成为纨绔子弟，家境就会衰落；相反，贫困家庭子女吃过苦，就会奋发努力，家族就会兴旺发达起来。汪山土库程氏家族能够七八代长盛不衰，重视教育是一大秘诀。他们先是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不论男女，包括家庭佣人都要识字，养成优良品德。逐渐发展到办私塾，招生范围扩大到整个汪山村、大塘地区程姓子女，随后又组织“宾兴会”，并管理“北京新建会馆”，为新建县举子进京科考提供了资助和便利，创造了一个重教崇文的大氛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传统，成为汪山土库程家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

一、汪山土库发家始于教育

追根溯源，汪山土库祖先是种田养鸭的，至乾隆年间（1736—1795）程启垣开始读书，但没有考取功名。他的两个儿子程楷（字九龄，号模山）和程达先（字养贤，号笏堂）两兄弟也读了私塾，连个庠生（秀才）都没考上。但他们并不气馁，至孙辈程裔采、程焕采、程楙采兄弟时，礼聘大塘地区最好的塾师程聘野先生来教馆，遂有了后来的成就。

程聘野，谱名逢莘，号学圃，程氏恭房人，住大塘街，一生以教书为业。他为人正直，博学多才，文品俱佳。有一年春，厚石裘村请聘野先生教馆。聘野用水车的手柄驮着行李步行前往。裘村绅士见先生一身农夫装束，步行而来，很是瞧不起。入席时仅随意招呼一声，又有人提议开席前请先生为学馆写对联，他当即依村前景观写道：“笔插安峰写尽乾坤锦绣，墨磨厚石读通古今文章。”随后扬长而去。众人这才知道聘野先生才学非凡，再三请他教馆，而他不去了。

聘野先生诗文远近闻名，省城附近的港口曹村曹秀先，官至兵部尚书，大书法家，他家兴建花园，专请聘野先生题诗刻在园中。

这一切，程裔采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经常送粮食给这位怀才不遇的聘野先生，帮助他渡过难关。待裔采到了入学年龄，便正式请聘野先生教子。聘野先生于乾隆己酉（1789）年春收下程裔采作为他在汪山村的第一个学生。学馆设在大塘程氏祠堂。启垣和两个儿子也跟着上“短学”，利用农闲时间读一至两个月；裔采则上“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三年后，老二程焕采也入了私塾，老三程楙采有时也跟老大、老二去学馆玩，五

岁时也入馆读书。聘野先生注重养成他们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要他们学必要的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以及各种称谓等,同时识字、背书。教材是通行的“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初步完成识字教育后,即开始读书。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强调熟读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三、百、千”,还有《名贤集》《神童诗》《五言杂字》《七言杂字》,再就是《四书》《五经》。四书先读《大学》《中庸》,后读《论语》,最后读《孟子》。

聘野先生对程裔采、程焕采、程楙采三兄弟格外精心、严格,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楙采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时,焕采读《论语》,裔采就读《孟子》或《左传》。先生正襟危坐,三兄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他们复述。然后各自回座位朗读。老三有些调皮,聘野先生经常打掌心教训他。当时的书没有标点,先生教读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他们跟着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这就是所谓句、逗之学。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然后学生自读,一遍又一遍,大约读一两个小时,然后到教师面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初读二三十个短句,学生很快读熟,能背诵。下次教读新书,多读二三十句,如仍旧能很快读熟,背诵,便再加一些。老三聪明记忆力特好,每天读百句以上,也能背诵如流。

聘野先生教人读书,首重字形、读音,区分四声。记牢读音,也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因为把《四书》《五经》读熟,背诵如流,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二者缺一不可。还要学会写字,不但要会写大楷、小楷,而且为了科举考试功名,还要把字写得更好,写成馆阁体,达到翰林院的标准。这些私塾教学的基本内容,就是学会作八股文的基本功。每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写字两小时,对对子只半小时或一小时,带有趣味性,一般都放在下午快放学时进行。

以上是初级阶段的学习内容。在此基础上就要开讲,讲《四书》的朱熹注解,读八股文选,再学写八股文。聘野先生因病过早逝世,他们兄弟痛失良师。程裔采父亲和叔父不惜代价,让裔采三兄弟到金桥牛头山半云庵拜熊豹文先生为师。

熊先生是金桥茹房村人,虽是文举人,武功却也很高强。他们兄弟来拜师时,裔采、焕采已学完《四书》《五经》,能背朱熹的注解。熊先生还是让他们经常温习,同时研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全唐诗》《全宋词》等,还有《小题正鹄》《临文便览》等八股文和应试的必备书籍。而且每天“闻鸡起舞”,练习武功。老三楙采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能背。尤其是《四书》,要连本文带朱注,烂熟于胸中。

学写八股文的过程,先是学习八股格式 “破题”、“承题”、“起讲”、“完篇”,再讲究法度、思路,有没有见解、精彩不精彩等,追求深度写出水平。熊先生首先是在读熟《四书》《五经》,明辨四声学会对对子的基础上,教会作八股文的形式。裔采、焕采在熊先生这里学了七八年后,到县里考童生、参加府里的考试。嘉庆庚申(1800)恩科乡试,裔采中第49名举人,嘉庆辛未(1811)会试中第27名进士。接着,嘉庆癸酉(1813)老三楙采登拔萃科,中乡试第13名举人,次年甲戌科(1814)中第140名进士,殿试二甲。嘉庆丙子(1816)老二焕采中第49名举人,嘉庆庚辰(1820)会试中第53名进士,殿试二甲。至光绪壬寅年(1902),程家考取举人以上功名的有11人。

程家人尊师重道,三兄弟当官后对熊豹文先生特别尊敬,每次返乡都要备上厚重礼物拜见熊先生。他们如果从水路经樵舍去茹房见先生,在离茹房村六里地的有福庵就开始下轿步行;离开先生家返回大塘,步行到了照洛岗(约五里地)才上轿。他们年年给先生经济资助,并交代程氏族人呵护熊氏族人,保护熊氏耕地,但先生吸鸦片成瘾,没有积蓄。后来三兄弟出资为熊先生做了一幢九柱落地的大房子。

程楙采在西北平叛,捉住了张格尔,皇上召见,

问: 你是读书人,为何有武功。答: 我先生熊豹文是举人,文武双全,是他传授的武功。皇帝遂召见了熊豹文,赐给“钦赐国子监”金匾一块。熊豹文在大厅挂出此金匾,又挂出程氏三兄弟送的“璠溪娱老”匾,顿时远近闻名。当地人说: 熊家先生程家官,真是风光。

二、汪山土库兴旺得益于“义学”

三兄弟做官以后,不仅建了大豪宅,而且支持父辈已经开始的义举,继续购买田地,置义田、建义仓、办义学。

义田的租谷收归程文宝公管理的义仓,一部分发给族中鳏寡孤独者,每人每月一斗谷; 一部分用于办义学,即私塾。族中规定程氏后人都要进私塾就读,只要愿读,可一直读到考取功名。大塘地区他村他姓孩子有培养前途者和土库内“下人”孩子,也可入学,不收费,但“下人”孩子只能读四五年,便就地“就业”,或做少爷、小姐的书童、佣人,或在屋内从事其他工种劳作。

程氏义学最初设在大塘程氏祠堂,汪山土库建成后,设在稻花香馆,时间约为咸丰辛亥(1851) 年,后来又在土库内增设“望庐楼”,专供少爷、小姐读书。稻花香馆,东边有住房、餐厅、伙房。西边是授课场所,内有六间教室,厅堂挂有孔子画像,下面的大厅两旁是《论语》和理学名言及朱熹所订“白鹿洞学规”。俨然一所全封闭的私立“贵族”学校。

程氏子孙中,程鼎芬、程志和、程志清等进士、举人,几十名四、五品官员,都是从稻花香馆培养出来的。从《程氏家谱》的“汪山土库功名仕宦录”得知: 继裔采、焕采、楙采之后,道光、咸丰年间有亮采、福培、迪芬、福增、迪莘、迪兰、志清 7 人; 同治年间有秉钧、炳堃、迪芳、迪华、迪英、迪萱、方德、迪蕃、志铬、志和 10 人; 光绪年间有道存、方第、谊存、绍祖、志曾、志勋、绍光、毕、绍颐、汝恒、汝观、建铖、绍徽、乾、建钊、汝彝、绍宗、枟、震廷、时燡、时焴、学恂、学愷 23 人,显示出向上发展的兴旺气势。正所谓“学子读书应上庙堂酬壮志,男儿济世何堪泉石寄闲身”。

民国时期的世济、学怿、天放、学恂、时煃、翠英、懋筠、应锳等一批官员和社会名流,也都是从稻花香馆和望庐楼私塾走出来的。

民国时期程家还在大塘街程氏泰房祠堂办过石泉一小(程文宝公,号石泉,由此命名) ,由文宝公孙女程其让担任校长。程其让毕业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曾在南昌射步亭小学当校长多年,为了家乡的教育,1935 年来大塘办学。“望庐楼”改为石泉二小。大塘地区其他村其他姓氏学生也在这两个小学读书,学校教师的工资由民国政府发放(得益于程时奎任省教育厅长) ,其他经费均由义仓开支(包括老师吃、住、教学用具和课本等费用) 。抗战时期停办,1945 年又恢复。为方便程家子女上省城南昌读书、考试,程家还在南昌西湖建了一幢三层楼十多间房的“程公书院”,也称“石泉别墅”或“程家试馆”。汪山土库程家的义田、义仓、义学之举,一直延续了百余年,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才终止。

值得一提的是,汪山土库没有绣楼,在“男尊女卑”的清代封建社会环境下,程家的女孩都不做女红,而是读书。程裔采之女程福兰、程学恂之女程琇,其学问都不比男子逊色。程琇留学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正大学教授,民国时期为立法委员。请看程福兰诗两首,是那么的清丽、婉转。

东　　湖

百花洲畔柳垂青,月点波心夜放舲。
四面荷花香裊裊,渔歌一曲隔舱听。

送　春　词

青春云兮何时归? 白日出兮扬光辉。
蝶寻花兮花满地,山叠翠兮翠侵帏。
堤柳垂兮风扬扬,雨后晴兮岚气瘴。
绿生惨兮红复愁,春已去兮独惆怅。

三、注重家族子女的品德教育

汪山土库程氏有乐善好施的传统。始迁祖程玉琭,大约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 来此定居,以养鸭、种湖田为生计,终年辛劳,略有积蓄。他秉性忠厚,乐善好施。有一天,发现附近一户穷人整天未烧火做饭,他琢磨定是断了粮,便假意去点火,在其灶口放了些粮食、鸭蛋,使其渡过饥荒。平时,有逃

荒讨饭者，他都会施舍和救济，故当地人无不称颂，尊称他为“鸭太公”。

到了程裔采时期，他们有了更大的能力帮助和救济穷人，除了灾年拨些粮食救济穷人外，还出钱兴修水利，构筑圩堤。与此同时，注重培养子女勤奋好学，明理诚信，养成良好品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严格的家训、家教和家法。程氏祖堂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程氏家训选录》中有：

“一曰要吃亏；二曰学吃亏；三曰吃得亏；四曰还不算吃亏。”

“惜福者添福；享福者减福。”

有势不可使尽，有福不可享尽，贫穷不可欺尽。使势、享福、欺人，本损德事，况乎尽乎？此真富贵家药石之言。

“‘求己’二字是一生受用，道德、学问、功名皆从此出。”

“有仇不报真君子，有恩不报枉为人。”

“人非才不能干事，然能干事恃才傲物亦招祸之尤也。”

“读书贵能经世，为学先戒自欺。”

“富贵无常。今日我贵骄人，异日人贵亦骄我。势位之危，危于朝露，可慎哉！”

家教、家法写明：

“尊长敬贤、唯礼是尊；孝顺父兄，共敦友爱。

待人持物，仁义为本；自省其心，非礼莫为。

不事人非，教子宜家；居乡为善，和邻睦族。

恬淡俭约，度入量出；声华奢欲，非礼莫近。

廉慎以持，敬业唯勤；修齐治平，兴邦利民。

忤逆犯上、肇生是非者杖责并游行示众。

有辱斯文及礼义者，警训改过、责令自新或处以鞭责。

偷盗、奸淫、劫杀、抢掠者，一经发现，沉河处死。”

二是树立勤奋好学的榜样，培养爱国为民的志向。程楙采小时候机灵鬼怪，常常恶作剧，后在熊先生教育下，痛改前非，发奋读书，竟食不甘味，寝不解带，日夜攻读，待至上京科考，一举成名，喜登金榜。道光十六年（1836），程楙采被提升为安徽布政史。刚上任，时值长江涨大水，地处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宿松县内康公堤十分危险。这座圩堤保障三省部分群众生命财产，程楙采日夜在圩堤上指挥抢险救灾。他身为行政长官，积极从各方面筹集资金，发动群众，加高加固圩堤，而没有向当地官府及群众摊派，当地群众非常感激。

据传，在洪峰来到的关键时刻，风大浪急，圩堤摇摇欲坠。程楙采在危急时刻，从头上取下官帽，抛入滚滚波涛之中。顿时，奇迹出现了，汹涌的波涛平静下来，洪水也慢慢退下。这时，圩堤上民众一片欢腾，齐声高呼：程老爷保住了圩堤。抗洪结束后，民众在圩堤上立了一块石碑，记述了这次抗洪斗争的经过，并改称此堤为“程公堤”。

道光十九年（1839），程楙采被提升为安徽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察、兼提督衔，并理安徽学政。这时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向朝廷上奏《防夷务练水勇疏》，指出：“海疆要著，莫亟为募练水勇，酌减客兵。”他认为客兵调至海防有三不便：一是客兵在路上奔走，筋疲力尽；二是不服水土；三是后勤工作供给不上。而从当地招募水兵有五条好处：一是当地人员生活在海边，习惯海边风浪；二是当地人熟悉海岛路径，容易侦察敌情；三是自卫家乡，积极性高；四是招募当地人，战时入伍，平时可以返家；五是节省物力，用支付客兵的经费训练兵团是绰绰有余。当时安徽的兵勇多调浙江，程楙采下令在当地招募民兵进行训练，防止英军入侵。后来，江宁告急，楙采立即赶赴芜湖，勘察地形，招兵防堵，并选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